

# 创新与保守都是效益

胡培兆

联系酿成美国金融危机的行为逻辑,就创新与保守问题谈点感受,谨供参考与批评。

在我国改革开放中,经济特区作为排头兵和试验区,立下了头功。而深圳是特区中的特区,其成就、贡献和影响高居首位。在深圳的硬实力突飞猛进的同时,软实力也在飞升,文化、教育等事业获得巨大发展,成为我国新兴的文化强市,充满凝聚力和吸引力。软实力的发展对硬实力的发展又作出了积极的反作用。

在经济特区还要继续办而又没有赋予新的特区经济政策的条件下,需要自己开拓新思路,做好新特文章。但是创新与保守、跨越与稳健是相对的,要因时因地制宜。有时保守稳健也是制胜的高招。

现代世界经济行为普遍缺乏理性,在疯狂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浮躁中,不断制作经济泡沫,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震荡。经济实力最强大、金融工程最发达的美国,从2007年以来的4年中,竟连爆三次危机,次贷危机、金融危机、债务危机三连贯,雪上加霜。但在许多银行陷入资不抵债的泥沼大呼“bailout”(政府资助)时,有些银行却例外地过得悠然舒坦。如夏威夷银行、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市联合银行(United Missouri Bank),华裔的华美银行和国泰银行都很优秀。危机中不仅没损失,还发了“危机财”,存款、盈利和资产都增加。原因是这些银行在别人热火朝天炒房贷衍生品时,淡定神闲,不动心,不眼红,长期坚持传统业务和保守经营方式。稳健使它们因祸得福。夏威夷银行的总裁(CEO)轻松地说:“无聊是好事(Boring is good)”。

华美银行是专门为华人移民服务的,在1991年还不过是洛杉矶唐人街的一家零售银行,只有6亿美元资产,200个员工。在金融危机中,不仅收购了一直压在它头上的竞争老对手三藩市的联合银行,而且资产已扩大到200亿美元,员工2600多人,成

为加州第二大银行。

斯蒂格利茨在《自由降落:美国、自由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沉没》一书中,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,他认为,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体系在房贷市场快利的诱惑下,背离固有的核心功能走得太远,冒险参与赌博性投机,结果被套死。他的分析,符合美国金融界偏重金融衍生产品的行为逻辑与事实。再联系到老谋深算的英国不参加欧元区,避免了目前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连带责任和一些矛盾纠结,也不失为是胜算高招。

从以上迹象看,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,审时度势是必要的,要警惕经济全球化也即危机全球化,不必事事都要去跟风赶潮的。

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,各地都在高起点地跨越发展。但在经济高速增长、大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大喜中,也有“社会矛盾明显增多”的忧虑。其中经济质量矛盾就相当突出,增长质量、管理质量、工程质量、产品质量、服务质量、广告质量等都不尽人意。质量问题,邓小平在1985年就郑重提出:“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生产,中心是提高质量,把质量摆在第一位。……要提高质量,就必须改革。要立些法,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,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。这一关把住了,可以减少很多弊端,卡住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。质量问题虽然经常提,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,要突出地提,切实地抓。”现在出口产品质量高,可国内市场供给质量还是差强人意,处处有触目惊心的购物陷阱。在数量型的跨越发展到一定阶段,质量型的跨越发展就十分必要,特别是伪劣假冒产品价高质低的不良供给,抑制有效需求的市场环境下,提高质量,优化供给,更是扩大内需所必要的。过去我们说,不希望在战场上中国人打中国人,今天我们也不希望在市场上中国人坑中国人。如果深圳能在全面提高质量管理水平方面勇当

收稿日期 2012-02-28

作者简介 胡培兆(1937—),男,浙江永康人,厦门大学教授,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。

排头兵,起示范作用,也是个重大贡献。相邻的香港是著名的购物天堂。购物天堂,也是经济实力的综合体现和重要标志。深圳虽然不是自由港,但凭现有的技术物质条件,全面加强质量管理,也可以建设成为境内的购物天堂,凡是深圳的产品在质量上都是金字招牌的优质产品,就必定会在市场竞争中胜出,市

场占有率必定会有跨越式提升,从而带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和谐地全面发展,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经济增长矛盾减少的新路子。

【责任编辑:来小乔】

## 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

### 苏东斌

对于当年苏联解体、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,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,本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早有共识,这就是:帝国总是要崩溃,人民一定要解放!

可是近几年,一股思潮又在泛起。比如,认为:“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‘斯大林模式’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,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、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”<sup>[1]</sup>。

这类典型的“叛徒说”,既违背了历史,又否定了逻辑,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。这真是一段奇文,建议大家还是有意识地欣赏一下。

—

下面引来几段,可供参考:

1. 国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,现任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他的代表作《前进——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前途》一书中鲜明地揭示:“苏联没能能够保留下来,是因为对政权的垄断腐蚀了党,是因为力求把绝对真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,深信一种所有制形式的牢不可破。我们从这里得出了严肃的结论。现在,在俄共党纲中直截了当地写道:当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还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时,就不能用命令取消他,也不能把一党执政制度强加于社会,更不能把自己

的意识形态变成唯一的意识形态。”<sup>[2]</sup>

早在 1995 年他就说:“苏联和苏共跨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、权利和真理的垄断。它断送了国家,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,直接出卖民族利益。”<sup>[3]</sup>

2. 曾任苏共第二书记的利加乔夫指出:“另一条路是回到过去,回到国家社会主义。这也是不能接受的。国家社会主义的潜力已经耗尽,并开始成为前进的阻力”<sup>[4]</sup>。

3. 曾任两届俄罗斯总统,现任总理普京说,“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,社会昌盛,人民自由。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俄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。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,但是我们将近 70 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,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。”<sup>[5]</sup>

二

在这里要申明的是:

如果肯定了“斯大林模式”,那岂不等于说中国上世纪 60 年代的“反修防修”、“九评”等共产国际论战中国是正确的?!

如果肯定了“斯大林模式”那岂不等说,长达 10 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宗旨都是“完全必要的,是非常及时的”?!

进而言之,如果真是那样,那我们今天怎么会得

收稿日期 2012-02-28

作者简介 苏东斌(1944—),男,黑龙江哈尔滨人,深圳大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及中国经济特区问